

# 一甲不預，則望館選 ——王肯堂的科名與萬曆科舉世風

連文萍\*

## 摘 要

王肯堂出身科舉世家，父、祖皆為進士。其性喜學醫，以業舉而棄去，久困場屋，於萬曆 17 年己丑科中進士，惟年已四十，又名列三甲第一八四名，深有失落。幸而參與翰林院館選，榮膺館元，一雪前恥。其後於翰林院讀書，累積學力，館課居前，為庶吉士之佼佼者，獲留館為翰林院檢討，可惜因身陷黨爭而黯然去職。本文討論其科考相關經歷，一窺名第對新進士的影響，也論述萬曆時科場日壞、館選競逐、黨爭傾軋等風氣。王肯堂身受朝廷栽培，最終難有作為，不僅是個人與家族的失落，尤見朝臣不能戮力同心，反是各懷猜忌、營私攬權，正為明廷步向衰亡的重要原因。此外，其未有個人別集傳世，本文輯得館課文二十三篇、詩十六首，可略窺其文章才具，並見當世翰苑掄才育才的成效，及人才不能為國所用的困境。

關鍵詞：王肯堂、庶吉士、翰林院、科舉、萬曆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Wang Ken Tang's Scholarly Honors and Public Morals in Wan Li Imperial Examination

Lien Wen-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Wang Ken Tang was born in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because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palace graduate. He gives up being a doctor, and he is becoming a palace graduate when he turns to 40 years old. He is number 184 in the rank, which he is not satisfied with his ranking. Fortunately, he was admitted to the academician recruit of Han Lin Academy Department. He studies hard when he stays at Han Lin Academy Department. Finally, he got a very good result among the *Shujishi* (which means "All good men of virtue" is a scholastic titl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of China) and he retained as Han Lin *Jian Tao* (Official position, the person that who write the Dynasty history) and he quit the job because of the faction's struggles. This paper focus on Wang's Imperial Examina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bad morals of the society, although he was cultivated by imperial household, but the morals breakdown, this is the main problem which causes Ming dynasty being declined. Since Wang had no handed down his personal corpus. Thus, this paper based on his 23 articles and 16 poems, within those opuses to analyze his talents and virtue. Moreover, we can know the methods of Han Lin Academy cultivates to the talented person, and unrecognized talents in the country.

**Keywords: Wang Ken Tang, Shujishi, Han Lin Academy, Imperial Examination, Wan Li**

# 一甲不預，則望館選

## ——王肯堂的科名與萬曆科舉世風\*

連文萍

### 一、前言

明代科舉考試中，廷試重新排列貢士的名第，一甲錄取三名為「進士及第」，二、三甲若干名分別為「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等第鮮明，尊榮有差，尤攸關授官與仕途。一甲之榮喜不言可喻，二、三甲進士雖亦題名金榜，卻可能別有不同心境，社會評價也有差異。名第對新進士的影響，歷來多聚焦於一甲甚或連中三元等頂尖榮耀，對於二、三甲進士則籠統看待，未及深論。

萬曆 17 年（1589）己丑科，王肯堂（1549-1613）以四十之齡考中進士，但名列三甲第一八四名，心中喜悅與失落兼而有之，難向外人道也，他以家書向父親王樵（1521-1599）傾吐。王樵回覆道：

今之人，會試則望中會元，廷試則望中一甲，一甲不預，則望館選。館選美矣，及解館之日，又有說焉。留在翰林者為上，出為科道者次之，且科道自外官行取者視為極選，而又有不滿於此者，種種差別，皆起於人之欲望無涯也。<sup>1</sup>

王樵是嘉靖 26 年（1547）進士，家書提到世俗以會元、一甲及館選為榮，顯見王肯堂名列三甲後段，並非「高中」。王樵雖以「人之欲望無窮」寬解，實則「一甲不預，則望館選」才是重點，因為此乃二、三甲進士的翻身機會。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031-051-MY2）的部分研究成果，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

<sup>1</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291。

所謂「館選」，指翰林院<sup>2</sup>考選庶吉士，是明代遴選、培育高級文官的制度。每科二、三甲進士錄平日所作文字，包括論、策、詩、賦、序等十五篇以上，進呈禮部，送翰林院擇選。禮部偕閣臣出題考試，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選為庶吉士，得以與一甲進士入翰林院讀書，以備日後進用。<sup>3</sup>由於館選不一定每科皆開，庶吉士名額亦僅二十餘名，榮貴非常，時人皆以「儲相」目之<sup>4</sup>，故而競爭十分激烈。王肯堂幸運通過館選，且排名居首，榮膺「館元」，得以一雪前恥。但他廷試排名太後，館選公平性深受質疑，加上捲入政爭，毀謗相隨，其後仕途中輟，均為政壇矚目，並入錄史冊。最特別的是，其廷試、館選、散館等過程，都被王樵寫入家書，父子無所不談，其力圖自振的幽微心境也呼之欲出。

科名之外，王肯堂在經學、律學、佛學、書法、篆刻等俱有造詣，著有《尚書要旨》、《論語義府》、《鬱岡齋筆塵》、《律例箋釋》等。尤精於醫學，所著《證治準繩》，史稱「該博精粹，世競傳之」<sup>5</sup>，他如《傷寒準繩》、《幼科準繩》、《女科準繩》，均被醫家奉為圭臬<sup>6</sup>，惟未有個人別集存世，難以見出其文學成就。目前學界對於王肯堂的研究，以醫學思想及論著為主，亦有生平考述，但未能深論其科考仕宦的處境與心態變化。<sup>7</sup>本文另闢蹊徑，專論王肯堂的應考、科名與任官經歷，並輯出館課詩文，以見其文章才具，同時論述其家族成員之科考與姻誼，一則增補王肯堂研究

<sup>2</sup> 翰林院又稱翰苑、館閣、詞林、玉堂，見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32，〈翰苑考〉，頁398-399。

<sup>3</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70，〈選舉二〉，頁457。

<sup>4</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70，〈選舉二〉，頁457。

<sup>5</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221，〈王樵〉附〈王肯堂〉，頁1569。

<sup>6</sup> 王肯堂醫學論著眾多，今人陸拯編有《王肯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行世。

<sup>7</sup> 王肯堂醫學成就的論述，可參考劉元：〈明代醫學家王肯堂的生平和著作〉，《中醫雜誌》1（1960.1），頁67-70；潘華信：〈糾偏頗，振墜緒，拯世溺——評王肯堂的學術成就與貢獻〉，《上海中醫藥雜誌》10（1994.10），頁1-4。論述生平，主要有王重民：〈王肯堂傳〉，《醫史雜誌》3（1951.3），頁41-42；秦小平：〈王肯堂傳略〉，《常州教育學院學報》4（1995.4），頁9-11。邱澎生：〈有資世用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33：1（2003.6），頁1-43，討論王樵、王肯堂父子的法律見解。倪梁康：〈王肯堂及其《八識規矩集解》〉，《中山大學學報》55：2（2015.3），頁96-123，討論其佛學思想。又有柯卉：《王肯堂的生平與學術》（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1）、諸穎政：《晚明士人知識趣味的多樣性——以王肯堂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潘志剛：《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6），對於王肯堂生平與論著討論較深入，可參考。

之不足，一則考察科舉世家之興頹，藉以照看萬曆己丑科新進士的競逐，以及晚明的館閣文化與科舉世風。

## 二、一門數代的應舉之路

王肯堂，字宇泰，號損庵，又號念西居士，南直隸金壇人，出身科舉世家。祖父王臬（1477-1553），字汝陳，號遲庵，正德 12 年（1517）進士，名列二甲第十七名，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曾疏諫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南巡，被杖責，官至山東按察司巡海副使，著《遲庵集》。父親王樵，字明逸，號方麓，嘉靖 26 年（1547）進士，為三甲第十五名，授行人，歷官刑部主事、尚寶卿等，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著作等身，有《方麓集》、《周易私錄》、《尚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四書紹聞編》、《讀律私箋》等。<sup>8</sup>

王肯堂為王樵次子，自幼天資聰穎，好讀九流百家之書<sup>9</sup>，備受父親栽培，希冀搏取高第。惟因母病，群醫莫衷一是，因而啟發學醫之心，常篝燈夜讀醫籍，還曾投身蘇州名醫薛延卿門下學醫。<sup>10</sup>復因妹罹重症，其根據病情和脾性，審慎施藥加以治癒，因此名震鄉里，求醫者絡繹。王樵擔心妨礙舉業，嚴加攔阻，王肯堂曾在〈證治準繩·原序〉追記：

余髮始燥，則聞長老道說范文正公未達時，禱於神，以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因嘆古君子之存心濟物如此其切也。當是時，顛蒙無所知，顧讀岐黃家言，輒心開意解，若有夙契者。嘉靖丙寅，母病阽危，常潤名醫，延致殆遍，

<sup>8</sup> 王臬生平見今人孟濟元主編：《金壇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王臬〉，頁 782。王樵生平見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 541-548。又見清·郭毓秀：《金壇縣志》（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 20 年序刊本），卷 12，〈王樵〉，頁 10-11；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21，〈王樵〉，頁 1568-1569。

<sup>9</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前，頁 1。

<sup>10</sup> 孟濟元主編：《金壇縣志》，〈王肯堂〉，頁 783。

言人人殊，罕得要領，心甚陋之，於是銳志學醫。既起亡妹于垂死，漸為人知，延診求方，戶屨恒滿。先君以為妨廢舉業，常嚴戒之，遂不復窮究。<sup>11</sup>

可知王肯堂熱衷學醫，一乃天性所近，一則仰慕宋代范仲淹（989-1052）之存心濟物，一因母、妹重病而群醫束手。學醫本是明代士人的人生選項之一，時人有謂：「醫可濟人，最能種德」<sup>12</sup>，然王樵「嚴戒」學醫之由，乃在科舉世家子弟的個人價值與人生責任，重在延續家族科舉事業與主流地位。

王樵共有啟疆、肯堂、干城、岳陞四子，皆令業舉。長子王啟疆累舉不第，以選貢發身，擔任教職，王樵以家書殷殷叮囑「守規矩，勤職業」，尤要求「閒暇即溫習經書，玩心義理，修身慎行，自闡然而日章，他日之進，誰得而限之」。<sup>13</sup>考期將近，則促其赴考，並以今科取人必不同以往，為之勸勉：

近日禮部題准各省仍遣京官主試，不許外簾官干預閱卷，今科取人，必不循舊，必大改觀一番。汝材本可進，宜奮發志氣，澡雪精神，決此一舉，以為二親之光，以副相知之望。至囑至囑，千萬千萬。<sup>14</sup>

書中急切勉其赴考，目的重在「二親之光」，其次為「相知之望」，而非其子個人的情性與意願。王樵對其仕途多所掛心，曾致書焦竑（1541-1620）謂：「長小兒啟疆以漳州府學教授陞彰德府涉縣知縣，自以儒生不習為吏，欲告仍改教職，以便侍親，恐須比得有一例，敢求老丈為一查示，尤感尤感」。<sup>15</sup>王樵「以便侍親」之語雖是客套，實則對長子難以遂願，不無瞭然，對次子自是寄予厚望。

王樵三子王干城、四子王岳陞，都承受「二親之光」的期待，但皆為諸生。王

<sup>11</sup>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前，頁 2。

<sup>12</sup> 明·袁衷等著：《庭幃雜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下，頁 179。

<sup>13</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長男啟疆書二十二則〉，頁 285。

<sup>14</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長男啟疆書二十二則〉，頁 287。

<sup>15</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8，〈與焦太史〉，頁 271。按，據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 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 547：「長啟疆以選貢為涉縣令，先公卒。」故知王啟疆日後仍就任涉縣令，且不幸卒於任內。

樵的孫輩懋錕、懋鋁、懋鑛、懋鏗、鏡均業舉，為諸生。<sup>16</sup>其中王懋錕為王啟疆之子，王樵曾致書王啟疆云：「懋錕婚後，即督令就業」<sup>17</sup>，可知婚姻與科考皆為人生重責，王樵透過其子其孫將「二親之光」代代延續。王懋錕婚後生子王彥瀆(1585-?)，頗為穎慧，王樵為作〈彥瀆字說〉：

曾孫彥瀆為吾三世嫡長孫，人家蓋有祖孫不相識者矣，有識而逮事未久、知之不深者矣，今吾於彥瀆，則孫得識翁於尚健之時，且得以家學口授心傳，瀆穎悟而孝謹，其領受吾教甚敏而確。吾既命之名，今歲戊戌八月，督學使者試其可進，進之郡庠。年纔十有四，於禮未應有字，吾以為既游庠序，則朋友相呼，非字何以稱？則又為之字曰「孟原」。夫水之不已而漸近于海，以其有原也。瀆乎！瀆乎！俟女之知所進也，尚當以原之說為女申之。<sup>18</sup>

此文寫於「戊戌」，即萬曆26年(1598)。王彥瀆得授之「家學」，應指《尚書》，科舉世家常數代皆治一經，累積赴考實力，王肯堂即以《尚書》應考。<sup>19</sup>王彥瀆亦循此途，並於十四歲幼齡入泮，取得官學入學資格，王樵倍感欣喜，故以「孟原」為字，深寄期許。

王懋錕次子王彥泓(1593-1642)<sup>20</sup>，王樵卒時，年紀尚幼。其深富才情，喜為詩，後為明末著名詩人，著有《疑雨集》。王彥泓對舉業不感興趣，卻仍戮力業舉，以歲貢發身，出任訓導，但屢考屢仆，有志難伸，晚年尤窮困潦倒。侯文燦(1647-1711)在〈疑雨集序〉謂：

次回先生窮年力學，屢困場屋，斷瑤琴，折蘭玉，其坎坷潦倒，實有屈子之

<sup>16</sup>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547。按，此版本「懋鋁」誤作「懋鑛」。

<sup>17</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卷9，〈與長男啟疆書二十二則〉，頁286。

<sup>18</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卷13，〈彥瀆字說〉，頁377。

<sup>19</sup> 不著撰人，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萬曆十七年進士履歷便覽·王肯堂〉，頁8。

<sup>20</sup> 據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547，王彥泓為王懋錕之次子。鍾來因：〈王彥泓探考〉，《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85.6），頁66-73及《金瓶梅》·湯顯祖·利瑪竇·王彥泓父子——明季文學史上的文人關係，《福建論壇（文史哲版）》2（1986.5），頁68-72，均誤將王肯堂、王彥泓視為父子，應予更正。

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無聊，與杜少陵無家垂老之憂傷憔悴，而特托之於兒女丁甯、閨門婉戀，以寫其胸中之幽怨，不得概以紅粉青樓、裁雲鏤月之句目之也。<sup>21</sup>

王彥泓不幸困於場屋，只得將失落憾恨發之於香奩豔體。他的詩得到侯文燦的理解，也受到錢謙益（1582-1664）《列朝詩集》、朱彝尊（1629-1709）《靜志居詩話》的推重，但亦有沈德潛（1673-1769）編選《明詩別裁》，予以擯斥不錄。<sup>22</sup>王彥瀆、王彥泓的應舉雖屬後話，卻見王樵秉持王臬以來的甲第傳家，其強烈的意志與父權，貫穿一門數代，他們正是明代科舉世家的縮影，以成就功名、維繫家聲為人生責任，以「窮年力學」等待著難以預知的科名榮光。

### 三、奇驗的夢兆

即使父望殷切，王肯堂仍難抵情性所近，不時讀醫書、究醫理，舉業則漫無所成，直到萬曆 7 年（1579）中舉人<sup>23</sup>，時年三十。惟緊接著會試屢屢下第，至萬曆 17 年（1589）己丑科方成進士，年已四十。在漫長的投考過程中，王肯堂面對屢考不第的挫敗，曾引述友人「取科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之語<sup>24</sup>，將題名金榜視為命定，以緩解落第的灰心喪志，並積極祈求夢兆，以增信心、壯行色。

祈夢是明代的應考風氣，考生或出於主動祈求，或出於偶然得到，涵意似明末

<sup>21</sup> 明·王彥泓：《疑雨集》，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7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前，頁 285。

<sup>22</sup> 以上錢謙益等人之評，見明·王彥泓：《疑雨集》，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 172 冊，卷前，葉德輝〈重刊疑雨集序〉，頁 286。

<sup>23</sup> 按，王肯堂於萬曆 7 年中舉人，諸穎政：《晚明士人知識趣味的多樣性——以王肯堂為中心的考察》，〈年譜簡編〉，頁 46；潘志剛：《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研究》，〈年譜補編〉，頁 94，均註此年王樵家書有謂：「三月初二日得報，不但一家之人喜，雖鄉人無不贊喜」，實則此封家書寫於萬曆 17 年「己丑」，是王肯堂考上春闈會試之時，不應繫於萬曆 7 年。

<sup>24</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46。此為王肯堂記錄萬曆庚辰（萬曆 8 年，1580）下第歸，新建知縣張棟安慰之語：「公等無以得失介，取科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



明的夢兆，足以用來支持意志，一次次試探自我的命途，等待夢兆的揭曉。在當世廣被認可的程度，甚至成為館課彙編的評點內容，如《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所錄羅萬化（1536-1594）〈兵農策〉之評點：

按是科穆宗讀進呈十七卷，皆不愜旨，取散卷讀之，得羅卷，遂擢第一。不與進呈而獲鼎元，亦奇遇也。羅公會試時夢一老人，入其舟，揭去會試封條，易以第一甲第一名數字。將廷試，有戶部當該子方晝寢，聞異香透心，覺猶未散，遍訪無焚香者，惟羅公卷在焉，果擢首。<sup>25</sup>

羅萬化是隆慶2年（1568）戊辰科狀元，〈兵農策〉是其廷試勝出之作，評點未先針對文章講評，反而著錄夢兆異事，反映出世俗對狀元的傾慕情結，及對夢兆的深信。羅萬化之卷「不與進呈」，毫無一甲之望，夢兆幾乎註定難以應驗，不料竟因明穆宗朱載堉（1537-1572）欽點親閱，擢為第一，為歷科狀元少見殊榮。這類奇驗夢兆的真實性雖不無可議，但評點予以引述，猶如為之背書，因而在考生間愈發流傳。

王肯堂久困場屋，情志抑鬱，對夢兆即深信不疑。他在己丑科應考之前，與同考諸生住宿呂公祠以祈夢，並祝禱於神，願減壽以促中第：

余應己丑會試，與從兄德謀，及同年史崇質、甯顧寅，同宿呂公祠中祈夢。余且陰禱於神，以二親年邁，恐不及見余登第。倘是年不當第，則願減己壽，以促其期。已而就寢，至夜分，諸君皆覺曰：「無夢」。是時外舅于見素將南歸，未有定期，其寓在朝之西，而余寓在朝極東，日日穿朝往候送。是夜，余夢穿朝如平時，而已意以是晝所歷熟境，未必神告，而崇質曰：「子其登第矣，是入朝之兆也。」已而余果倖第，謂已驗矣。迨選為庶吉士，讀書翰林院，寓西而院東，辰而往，未而返，無不穿朝者，然後知此夢之淡而有味也。<sup>26</sup>

這則紀錄傳達出王肯堂面臨二親老邁，惟恐無法及時光耀家門的焦慮。進一步考察

<sup>25</sup> 明·王錫爵等編：《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6，〈策類〉，頁39。據明萬曆21年周曰校刻本影印，評點者名氏未註明。

<sup>26</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0冊，卷2，頁46。

文獻，發現他的焦慮尚有緣由。「外舅于見素」即王肯堂的岳父于明照<sup>27</sup>，出身金壇另一科舉世家，為正德 6 年（1511）辛未科進士于湛（1480-1555）之孫。<sup>28</sup>《鬱岡齋筆塵》謂：「萬曆庚辰，余與外舅于見素翁同下第歸」<sup>29</sup>，可知翁婿二人曾結伴應考。重要的是，于明照的兩弟子文熙、于孔兼（1548-1612）同時於萬曆 8 年（1580）庚辰科考中進士<sup>30</sup>，其子于玉立於萬曆 11 年（1583）癸未科中進士，名列二甲第四十三名<sup>31</sup>，故于明照謂：「天其盈我乎？盈則溢，吾其以謙承之。」即不復應考，引例乞恩，獲授南京都察院都事，闢園閒居。<sup>32</sup>相對於于氏家族的顯赫，王樵的失落更甚以往，王肯堂則壓力倍增，故有減壽之願。

王肯堂的夢兆奇驗，順利在己丑科考中進士，他也對別人的夢兆津津樂道，《鬱岡齋筆塵》記錄萬曆 20 年（1592）壬辰科狀元翁正春（1553-1626）的祈夢之事：

龍溪教諭翁正春，將赴南宮試，祈夢九鯉湖。夢神謂之曰：「三人同行，一死一故」，意甚惡之。已而狀元及第，其第二人晉江史繼偕，第三人崑山顧天竣也。<sup>33</sup>

翁正春夢兆有「一死」、「一故」，乍看為惡兆，卻為當科榜眼史繼偕、探花顧天竣（1561-？）姓氏的諧音，三人正是世所豔羨的「一甲」。這則記錄並非漫然引述，反而與王肯堂的友儕互動有關，因其與顧天竣為一起備考的摯友。顧天竣字升伯，號開雍，為弘治 18 年（1505）狀元顧鼎臣（1473-1540）的族孫，其「敏秀通理，

<sup>27</sup> 于明照，字元晉，號見素，為王肯堂岳父，據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頁 1935，引《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諸穎政《晚明士人知識趣味的多樣性——以王肯堂為中心的考察》（頁 46）及潘志剛《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研究》（頁 94），均作「舅舅」，有誤。

<sup>28</sup> 于湛見清·郭毓秀：《金壇縣志》，卷 9，〈選舉志〉，頁 11。

<sup>29</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46。萬曆庚辰為萬曆 8 年（1580）。

<sup>30</sup> 于文熙，字元敬，萬曆 8 年庚辰科進士，見清·郭毓秀：《金壇縣志》，卷 9，〈選舉志〉，頁 12。于孔兼，字元時，萬曆 8 年庚辰科進士，見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31，〈于孔兼〉，頁 1632、1633。

<sup>31</sup> 于玉立，字中甫，見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36，〈于玉立〉，頁 1664。

<sup>32</sup>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卷 9，〈于長公傳〉，頁 172、173。

<sup>33</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46。

讀書都于無味處得想，直徹針芒，無所註漏」<sup>34</sup>，萬曆 7 年（1579）考中舉人後，因會試落第，居山中讀書，〈顧天峻傳〉記錄：

提書囊從奚奴胡某直走萬山中，不扇不爐，無間晝夜。數常過金沙，與同籍生王肯堂相砥為沉博絕麗之文，力務獨詣。王第己丑進士，而公以壬辰登上第臚傳第三人，授編修，詞林諸先輩皆心下公，黃頭宮媵俱稱公才子。<sup>35</sup>

可知王肯堂與顧天峻的情誼，除同出身科舉世家、同籍及同落第，尤在讀書與為文之法的相通：讀書透徹、無所註漏，使得他們與一般庸碌短淺的舉子迥異；為沉博絕麗之文，務求獨詣，不肯跟隨世俗文風，使得他們應舉時易為俗眼所黜落。二人的真才實學最終獲得賞拔，分別登第，但傳記中顧天峻「登上第臚傳第三人」，尤見一甲名第之可貴，除直接授官翰林院編修，更在翰林先輩「皆心下公」，內廷俱譽「才子」，眾皆推服，榮寵非常。

王肯堂較顧天峻早一科中進士，光耀門楣，時稱「金壇父子進士相繼三代，前此未有」。<sup>36</sup>但此科二甲錄取六十七名，三甲錄取二七七名，王肯堂名列三甲第一八四名，遠不及祖父王臬考中的二甲第十七名、父親王樵的三甲第十五名，名次實在太後，使得金榜之喜夾雜遺憾，因而勢必如王樵家書所言「一甲不預，則望館選」，以館選力搏重振聲名。

#### 四、己丑科的館選競逐

萬曆 17 年（1589）己丑科庶吉士共選二十二人，包括王肯堂、劉曰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新德、周如砥、朱國楨、喬

<sup>34</sup>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集·崑山人物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 10，〈顧天峻〉，頁 722。

<sup>35</sup>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0 冊，卷 10，〈顧天峻〉，頁 722。

<sup>36</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293。

胤、唐效純、林堯俞、孫羽侯、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吾、郭士吉。<sup>37</sup>王肯堂榮登館選第一，由三甲進士翻身成為「館元」，令人刮目相看，王樵家書即謂：

汝在三甲，上而官府，下而親眷鄉族，皆有侮心。一聞翰選，便又改容易貌，世態日陋一日，正可付之一笑。然吾老矣，一生含恥忍辱，今甫欲藉汝一伸眉放懷，酣歌長嘯，作矍鑠之狀，以示俗眼。切勿復使前性，令我慄慄無氣也。<sup>38</sup>

此封家書傳達多種訊息，一則感嘆世態炎涼，科名不佳，即受輕侮。一則因選為庶吉士，倍感榮喜。一則發抒自身仕途不遂之慨<sup>39</sup>，「以示俗眼」可見展眉吐氣。一則見出父子因舉業與學醫之事多有齟齬，故叮囑在翰苑「切勿復使前性」，務須專注奮發，不可偏廢。

然而，此科館選因為名門子弟濟濟，競爭特別激烈，甚至多生猜忌，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記載：

罔伯為文肅通家子，朝夕過從，本無毫髮仇隙，特以己丑館選不得預，以此切齒，終身恨之。然是科入選者止二十二人，其時王宇泰肯堂為文肅至契，已居館元。而董思白其昌名蓋一世，自不得見遺。唐完初效純為荊川先生冢孫，乃父凝庵太常又次輔新安第一高足，用全力圖必得。則江南四府已用三人，萬不能再加矣。時松江陸伯達亦有聲，乃父宗伯平泉飛書力止之，叮嚀甚苦，伯達遂不赴考，時服其恬。罔伯家世不下唐王二公，遂憤憤不能解，每遇文肅大小舉動，必密偵以播四方，而文肅終不悟，以至於沒發揭事，余曾記之，近乃知出於王吏部。<sup>40</sup>

文中，「文肅」為王錫爵（1534-1610），此時官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為內閣

<sup>37</sup>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卷 212，〈萬曆十七年六月癸巳〉，頁 3978。

<sup>38</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297。

<sup>39</sup> 王樵自認宦途不佳，謂：「昔年我中進士，在三甲十五名，初選行人，意謂便可得差，不意為費鍾石所扼，守了一年半，方得四川極遠之省，輪該我行，費老已先許四川同年徐承嗣矣……。」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292。按：文中「費鍾石」為費象（1483-1548），正德 6 年（1511）進士。

<sup>40</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9，〈王文肅密揭之發〉，頁 238-239。

次輔，首輔則為申時行（1535-1614）。此科進士中，「罔伯」為王士騏（1557-？），名列二甲第七名，為王世貞（1526-1590）之長子，與王錫爵同為南直隸太倉人，有通家之好，其未預館選，心中不服，可以想見。又有名列二甲第一的董其昌（1556-1637），松江華亭人，「天才俊逸，少負重名」<sup>41</sup>，為必然之選。名列二甲第七的唐效純，常州武進人，為唐順之（1507-1560）之孫，唐鶴徵（1538-1619）之子，一門三代進士，唐鶴徵又為另一位次輔「新安」許國（1527-1596）的門生，參與館選勢在必得。

與眾不同的是「陸伯達」陸彥章，松江華亭人，名列三甲第九，為陸樹聲（1509-1605）之子。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為嘉靖 20 年（1541）會元，端介恬淡，「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首舉樹聲，唯恐其不至」<sup>42</sup>，其同里徐階（1503-1583）、同年高拱（1512-1578）相繼擔任首輔，力邀襄助，皆辭疾不出，聲望極高。陸彥章原本可預館選，但陸樹聲以家書戒之：

陸太僕彥章己丑登第，時當館選，文定公遺書戒之有云：「於家則疑盈滿，於國則妨俊英，毋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箴，兒謹佩之。」書至都下，聞者無不歎服。<sup>43</sup>

陸彥章聽從父訓，未預館選，實為科舉世家中的異數，此封家書流傳，聞者嘆服，此即沈德符所云「時服其恬」。此事日後入錄《明史》：「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誠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sup>44</sup>，成為陸樹聲父子的重要事蹟。

沈德符記錄王錫爵與王士騏的恩怨，肇因於館選，可見王樵所言「一甲不預，則望館選」的科舉世風，正為確論。除名門子弟的競逐，館選制度規定，須按地域分配名額，雲貴廣西三省進士人數少，每科輪選<sup>45</sup>，南直隸進士眾多，競爭最是激

<sup>41</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88，〈董其昌〉，頁 1998。

<sup>42</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16，〈陸樹聲〉，頁 1536。又見清·楊開第等纂：《重修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14，〈陸樹聲〉，頁 1086。

<sup>43</sup> 清·楊開第等纂：《重修華亭縣志》，卷 24，〈雜志〉，頁 1845。

<sup>44</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16，〈陸樹聲〉，頁 1536-1537。

<sup>45</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15，〈閣試〉，頁 391：「且自初考時，各省限定人數，而雲貴廣西

烈。王肯堂的廷試名第太後，又出身南直隸鎮江府<sup>46</sup>，能超越排名較前的名門子弟，頗難以服眾，加上王錫爵、王樵有交情<sup>47</sup>，故沈德符直謂「王宇泰肯堂為文肅至契，已居館元」，顯見當日就有徇私之議。

明末黃景昉（1596-1662）《國史唯疑》評論吳時來（1527-1590）、詹仰庇（1534-1604）被言官彈劾之事，疑肇因於與申時行、王錫爵友善而受到牽連，亦提及王肯堂：「士固不幸有當路之知哉，若黃洪憲、王肯堂跡蹤顯暴，又難例比。」<sup>48</sup>黃洪憲（1541-1600），字懋中，號葵陽，為嘉靖 35 年（1556）進士黃鏞（1522-1578）之子，隆慶 5 年（1571）中進士，選庶吉士，以文章受知於張居正（1525-1582），張居正敗，曾被誣以逆。黃洪憲的爭議，尤在主考萬曆 16 年（1588）戊子順天鄉試，擢拔王錫爵之子王衡（1562-1609）為第一名解元。<sup>49</sup>黃景昉將黃洪憲與王肯堂合論，視為「跡蹤顯暴」，卻未明言其事，可見已是廣為人知。

王錫爵是否徇私特擢，雖已不易考究，但王肯堂確實陷入政爭。王錫爵之子王衡於萬曆 16 年中順天鄉試解元，出黃洪憲之門，禮部郎中高桂（1556-？）摘發此次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中即有：「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sup>50</sup>王錫爵在內閣接到高桂的揭帖，上疏辨明：

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為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

---

三省，又每科輪選，如壬辰當用貴州，則是科止中一人為馬文卿，乙未當用雲南，則是科止中一人為佴祺，皆未入試，已知妙選屬之，最為可笑。」

<sup>46</sup> 不著撰人，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登科錄》，〈萬曆十七年進士履歷便覽·王肯堂〉，頁 8。

<sup>47</sup> 明·王樵：《方麓集》，卷 8，〈大理到任後奉政府荊石王公〉，頁 264；卷 8，〈奉內閣荊石王公〉，頁 268。明·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25，〈王方麓侍郎〉，頁 546。

<sup>48</sup> 明·黃景昉：《國史唯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 9，〈萬曆〉，頁 144。按，吳時來為嘉靖 32 年（1553）進士、詹仰庇為嘉靖 44 年（1565）進士。

<sup>49</sup> 明·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 冊，卷 5，〈少詹葵陽黃公神道碑〉，頁 145。

<sup>50</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6，〈戊子萬曆十六年〉，頁 394。

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為臣解疑。<sup>51</sup>

萬曆 17 年二月，王衡經多官覆試，以真才居第一，獲准參與會試，然為避免其父陷入更大政爭，並未應考。直到其父致仕，方於萬曆 29 年（1601）以一甲榜眼及第。

因政治氣氛敏感，萬曆 17 年二月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詹事府吏部侍郎王家屏（1536-1603）充主試官<sup>52</sup>，三月廷試，一甲為焦竑、吳道南（1550-1623）、陶望齡（1562-1609），其後館選揭榜，庶吉士則為王肯堂等人，名單已見於前文。

王肯堂雖非王錫爵之親族，卻被視為「至契」，王錫爵即使未主試事，仍無礙於擅權結黨，故難以排除猜疑。除此，王肯堂尤被科場風氣日壞所累，特別是張居正之子張嗣修（1553-1627）高中萬曆 5 年丁丑科榜眼、張懋修（1558-1639）高中萬曆 8 年庚辰科狀元之事，連王錫爵疏文亦直言科場風氣壞自張居正，以此自辯：

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皇上冲年，盡委之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何以望臣？又將何以德臣哉？<sup>53</sup>

因為科場風氣不佳，所以王衡高中解元，被劾「疑信相半」，此事持續為官場議論焦點。萬曆 20 年（1592），余冲宇曾向王樵詢問王錫爵的行期，王樵「對以不知」，余冲宇因言：「此老為乃郎科場事，失之性急。言者本為他人，而此老卻為他人出頭，不免將沒來由底是非一擔擔了。」<sup>54</sup>王樵以此事勸誡其子：

<sup>51</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卷 36，〈戊子萬曆十六年〉，頁 394。明·王衡編，王時敏續編：《王文肅公年譜》，收入于浩輯：《明代名人年譜》第 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著錄此事於萬曆 17 年二月。疏文亦見明·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 冊，卷 33，頁 16-21，題作〈辨論科場誣奏疏〉。

<sup>52</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卷 36，〈己丑萬曆十七年〉，頁 395。

<sup>53</sup> 明·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7 冊，卷 33，〈辨論科場誣奏疏〉，頁 16。

<sup>54</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余公此言甚確論也，然罪責言者出，荊老之不幸，天下自有公論，豈一二人之私心枉口所能揜，見怪不怪，彼魔妖行即自敗，但不宜我與之為敵耳。<sup>55</sup>

余冲字應即余懋學（1543-1599），隆慶 2 年（1568）戊辰科進士。他的發言甚有玄機，詢問王錫爵行期，可見認為王樵與王錫爵甚有交情，故有此問，其下的評論，則因高桂摘發可疑者皆有具體因由，王衡則是「疑信相半」而已<sup>56</sup>，故認為王錫爵「一擔擔了」。王樵將此事寫入家書，說明了政局的詭譎，他擔心其子受到波及，故要求不要涉入，不可與「言者」為敵。至於王衡之事，清末陳田《明詩紀事》評論謂：「江陵以鼎甲私其子，辰玉自有才，非懋修等倫也。」<sup>57</sup>顯見後世自有公論。

然而，萬曆時科舉世態清濁不分，不僅科場風氣敗壞，館選亦多有不公，《萬曆野獲編》即謂：

士人自鎖閣敷廷之外，其試事最重者，無如吏部之考選科道，內閣之考選庶常，尤為華選。先朝俱視文字為甲乙，且不拘定疆域，各以義命相安。今未試之前，采訪居其半，請託居其半，甚而暮夜先容，紙上之語，僅免曳白，便足入彀。<sup>58</sup>

所謂「內閣之考選庶常」即指館選，為當世欣羨的「華選」，時人曾有妙喻：「進士之入讀中秘書，是女子而選為帝妃也。」<sup>59</sup>惟揀選風氣今非昔比，已是有目共睹，造成當日有人熱中館選，也有人不與選，如王肯堂的好友湯顯祖（1550-1617），因張居正籠絡天下名士，「意欲要之入幕，酬以館選，而率不應」。<sup>60</sup>又如何棟如

310。

<sup>55</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10。

<sup>56</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卷 36，〈戊子萬曆十六年〉，頁 394：「鄭國望稿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惺、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張毓塘嘖有煩言，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按：李鴻為首輔申時行之婿，為高桂疏中摘發的焦點人物。

<sup>57</sup> 清·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庚籤〉，卷 20，〈王衡〉，頁 2592。

<sup>58</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15，〈閣試〉，頁 391。

<sup>59</sup> 明·方應祥：《青來閣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5，〈與孔中甫〉，頁 623。

<sup>60</sup>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87），卷 61，〈湯顯祖〉，頁 661。



(1572-1637)，出身科舉世家，父、祖皆為進士，其為庠生時，文名蔚起，後登萬曆 26 年（1598）戊戌科進士：

人有歆以館選者，公曰：「士方始進即詭遇，何底止乎？今日不親民事，何以知國家大計？士固各有志耳。」<sup>61</sup>

是知館選雖為「華選」，但人各有志，如湯顯祖不為館選所誘、何棟如願意親民事者，亦是所在多有。而王肯堂既選擇參與館選，就須面對王樵所謂「世態日陋一日」，既榮膺館元，就要面對館選不公的猜疑，只是沒料到日後不斷發酵，仕途亦深受影響。

## 五、翰苑讀書與館課競寫

王肯堂等庶吉士與一甲進士同入翰林院讀書，朝廷選擇沈一貫（1537-1615）、田一儁（1540-1591）、韓世能（1528-1598）先後擔任館師，王錫爵則為閣師。<sup>62</sup>王肯堂在翰林院兢兢業業，不時與父親通家書，惜今已不存，以下由王樵家書、《鬱岡齋筆塵》及同館友儕文集，考察其在翰林院的讀書經歷，並見當世館閣情境與人際生態。

### （一）讀書經歷

明代士人對科舉有複雜感受，既為發身之途，亦為羈絆之由，考中進士則為「脫了舉業羈絆」，王樵家書即謂：「汝今得脫了舉業羈絆，從此可以畢平生之志，何書不可讀，何事業不可進，真所謂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誰能限汝之到哉。」<sup>63</sup>王肯堂考中進士並獲膺館元，子酬父志，王樵老懷慰藉，以長信抒發欣慰：

<sup>61</sup> 明·范鳳翼：《范助卿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5，〈太僕寺少卿何公行狀〉，頁 399。

<sup>62</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45：「館師韓敬堂先生」；同卷，頁 62：「閣師王荊石先生」。

<sup>63</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291。

吾非為此選清華，將來要地可到而喜也，為汝出身之後，更得讀書進學，可以不負國家作養之意，天若有以大成汝也。惟吾知汝，惟汝能酬吾之願，未易為時人語也。書忌汎讀，須從經學世務上緊切用工。大抵學只有身心、世務兩事，理會得此兩事，則何事不了矣。以義理涵養，只從舊學中從新做起，蓋舊為應舉障礙，今纔欲身心上有受用處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只在喜怒哀樂四字上。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便是入聖頭路。其他談玄說妙，皆是自誑誑人，不足信也。<sup>64</sup>

此封家書可見「一甲不預，則望館選」之由，乃在庶吉士未來「要地可到」，王樵甚至上臻於天意，以為係「天若有以大成汝」，勉勵王肯堂把握機運、進德修業，以待日後有所成就。

家書另一重點在於指引讀書之法，顯見庶吉士在翰苑讀書與先前應考之學不同。王樵認為「學」主要是身心、世務二端，要求其子必須於身心處用功，多方累積學力，以便經世濟民。其說乃稟承儒家內聖外王之要旨，要求內在修養德性，外在則經世濟民，實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再者，王樵主張從舊學做起，不須談玄說妙。「舊學」就是儒家經說，本即身心受用之學，但科舉衍生流弊，儒家經說被窄化為科目之選、功名利祿之階，王樵要求其子在翰苑讀書時，要調整學習心態，由舊學出發，涵養身心、體會義理。

王肯堂秉持父訓，其治《尚書》應舉發身，在翰苑時能闡發經旨，著為《尚書要旨》。<sup>65</sup>而其無書不讀的特性，也深得館師器重，《鬱岡齋筆塵》謂：

余為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每邀入火房劇談，自世務外，於星曆太乙壬遁之學，無所不究。先生嘆曰：「惜子不遇趙文肅公，文肅公為館師時，日孜孜為余輩苦口，如子所談者，無所不談，惜吾輩素不諳習、無所領解。三十年來，僅見子耳。」<sup>66</sup>

<sup>64</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頁 293。

<sup>65</sup> 清·嵇璜：《欽定續文獻通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8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7，〈經籍考〉，頁 72：「張雲章曰：《要旨》一書，肯堂官詞館所撰，蓋原本家學，而為學士家說經訓詁之用者也。」

<sup>66</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45。

「韓敬堂」即韓世能，字存良，號敬堂，隆慶 2 年（1568）戊辰科進士，獲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其個性不慕榮利，「奉使朝鮮，贈遺一無所受」，入載《明史》。<sup>67</sup>「趙文肅」乃趙貞吉（1508-1576），字孟靜，號大洲，嘉靖 14 年（1535）乙未科進士，其以博洽聞名，擔任隆慶 2 年（1568）戊辰科館師時，教習內容寬廣，甚至曾課讀《楞嚴經》。<sup>68</sup>韓世能以其未能受教於趙貞吉為憾，「三十年來，僅見子耳」之語，尤肯定其好學勤讀，以為係庶吉士的佼佼者。王肯堂的表現，也受到王錫爵的鼓勵，曾要其與焦竑「讀中祕書」，《鬱岡齋筆塵》記錄：

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祕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為人取去。余嘗於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繁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己丑既入館，閣師王荊石先生謂余與焦弱侯曰：「君等名為讀中祕書，而不讀中祕書何為？吾命典籍以書目來，有欲觀者，可列其目以請。」少頃，典籍果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馬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一二存者，又多殘缺，訊之則曰：「丙戌館中諸公領出未還，故也。」時館長彭肯亭烺已予告歸，無從覈問。試以訊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則皆易以時刻人事書非復祕閣之舊矣。余亟令交還典籍，典籍亦竟朦朧收入，今所存僅千萬之一，然猶日銷月耗，無一留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於無片紙隻字乃已，甚可歎也。<sup>69</sup>

庶吉士讀中祕書之制，始自明太祖，到明成祖時成為定制。黃佐（1490-1566）《翰林記》謂洪武 6 年（1373）開文華堂以為儲才蓄德之所，選擇年少俊異者，命讀書其中，並詔儒臣等分教之。<sup>70</sup>王錫爵〈國朝館課續集敘〉謂：「館閣之有課試也，自聖祖六禩昉也。聖祖嘉張翀等才俊，命入文華堂讀中祕書，賜以冠服車駕。」<sup>71</sup>馮

<sup>67</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16，〈韓世能〉，頁 1538。據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 233，〈萬曆十九年三月乙巳〉，頁 4314，韓世能以教習庶吉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

<sup>68</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45。

<sup>69</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130 冊，卷 2，頁 62-63。

<sup>70</sup>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 4，〈文華堂肄業〉，頁 37。

<sup>71</sup> 明·王錫爵等編：《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2 冊，卷前，〈國朝館課續集敘〉，頁 533。

夢禎（1546-1605）〈刻歷科詞林館課序〉亦謂：

我朝館選，始於永樂間，取張唯等讀書文華殿，擇宿儒教之。蓋於中祕之書無所不探，而於諸體之文無所不習，亦無所不試，不獨詩賦也。養之數年，官其高等於翰苑，而漸柄用之。<sup>72</sup>

故庶吉士讀國家祕閣藏書以儲才蓄德，乃明立國以來的重要傳統，因此迭見記錄。然而，王肯堂受王錫爵之命，與焦竑讀中祕書，卻看到文淵閣藏書的日銷月耗、管理散漫，也坐實先前於馬氏樓所見祕本散落民間的情狀。是則「讀中祕書」的制度，到萬曆時面臨著考驗，也照會出朝廷綱紀缺乏整頓的問題。

## （二）友執情誼

在「同館」中，王肯堂與焦竑互動最密。焦竑，字弱侯，號澹園，「以道德經術標表海內」<sup>73</sup>，年近五十方得第，王樵曾以家書要其子與之親近：

焦從吾久聞其名，恐於心性上必已得力，可親近之，只性情上切磋琢磨，便是良師友也。<sup>74</sup>

王肯堂與焦竑同樣無書不讀，且久困場屋，故而聲氣相投，王樵也與之通信來往，其後焦竑之女與王肯堂之姪王鏡聯姻<sup>75</sup>，成為兒女親家，此乃明代科舉家族的常例。王樵老於世故，注意家族子孫的姻誼，王啟疆娶按察使賀邦泰之女，王肯堂娶都察院都事于明照之女，王干城娶尚寶卿靳弘之女，王岳陞娶雲南守張祥鳶（1520-？）之女，王懋鋁娶司寇姜寶（1514-1593）的孫女，王懋鋁娶汝州同知蔡近仁之女等<sup>76</sup>，可見王家透過通婚，連結跨世代的血統關係，意欲帶來政治與經濟的多重幫襯。

<sup>72</sup>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4冊，卷2，〈刻歷科詞林館課序〉，頁59。

<sup>73</sup>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附編二·徐光啟〈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頁1219。

<sup>74</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卷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293。

<sup>75</sup> 王鏡為王岳陞之子，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547：「次鏡，娶余女，岳陞出。」

<sup>76</sup> 詳見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547。

王肯堂又與陶望齡友好。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其父陶承學（1518-1598）為嘉靖 26 年（1547）丁未科進士，與王樵為同年，兩家可稱世契，故王樵曾兩次致書要求「加意」、「加厚」：

陶石簣兩世同年，乃尊泗橋老先生待我又素厚，汝當加意於世誼，須出汎常一格，乃為合所施之宜，千萬勿忽。

陶石簣處理宜加厚，蓋乃翁待我甚厚，又難得彼與汝又有世世嘉緣也。<sup>77</sup>

王樵的叮囑，一因「兩世同年」難能可貴，是行走官場的基礎人脈，一因維繫情誼的禮數必須提高，彰顯兩家關係非常。此外王肯堂與陶望齡均熱衷佛學，可謂興趣相投，而「兩世同年」亦帶來特別因緣。考察陶望齡文集，曾提及萬曆 17 年曾偕王肯堂、郭士吉<sup>78</sup>往謁李彘（?-1593）之事。

李彘字子仁，號重齋，嘉靖 26 年（1547）丁未科進士，與王樵、陶承學為同年，故此次拜謁是「兩世同年」的科舉佳話。世姪輩問安李彘，親聆佳音，深覺「灑然意斂，耳目皆新」，李彘亦留下極佳印象，故萬曆 21 年（1593）過世前遺命：「以狀屬肯堂，銘歸望齡，士吉介以往」。<sup>79</sup>陶望齡另寫有〈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其下署為「代」，乃代其父所作：

先生之子某，方以選為庶吉士，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為先生壽，而歸諸吉士君。予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為具言世俗所稱述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以明吾二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處之謂矣。<sup>80</sup>

是知王樵、陶承學相知頗深，而「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諸語，正見陶望齡等「年家子」的在朝互動，與一般同年同僚有別，通家世誼猶如後天的政治血緣，各種勢

<sup>77</sup> 以上引文見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05、307。

<sup>78</sup> 郭士吉，字希參，與陶望齡、王肯堂為同館庶吉士，見清·賈恩紱纂：《南宮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卷 18，〈郭士吉〉，頁 162。

<sup>79</sup>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8，〈晉府左長史重齋李公墓志銘〉，頁 430。

<sup>80</sup>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 冊，卷前，〈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代〉，頁 304。

力和關係也微妙的連結。

王肯堂與董其昌因書法藝術而投契，《鬱岡齋筆塵》曾著錄〈澄清堂帖〉一事：

余在翰林時，有骨董持一卷視董玄宰，玄宰絕叫，以為奇特。余告以吳江本，玄宰乃亟就王君求之，王君遂珍祕不復肯出。無何，王君物故，聞近亦歸太倉王荊石先生。<sup>81</sup>

文中顯示王肯堂對文藝鑑賞的熟稔，亦生動記錄董其昌的文藝愛好，「玄宰絕叫」尤見其情性之真率，甚至連「王荊石」王錫爵都是高品味收藏家。又有《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碑文為焦竑撰，董其昌行書，王肯堂篆額<sup>82</sup>，三人同署一碑，一文一書一金石，才力相當，受到時人推重，可見己丑科翰苑會聚人才，文藝風氣盛極一時。然董其昌與王肯堂因同出南直隸，分發散館時，受限於地域留館限額，頗有避讓與否的矛盾，將在下文討論。

### （三）養德養身

王肯堂致力的醫學，在翰苑多有發揮，曾治癒館師韓世能的膈痛病症。<sup>83</sup>醫術雖有助增進人際關係，得到親近館師、閣臣的機會，但王樵家書卻謂：

縉紳問醫藥，諸老託作文字，切勿有厭心、有難色。但以二事出名，皆謂有緣得進，頗於汝不利，婉曲善脫之為佳。<sup>84</sup>

王樵叮囑問診用藥為助人之事，代筆亦不可拒，尤不可將情緒形諸顏色，以免多有得罪。由此亦可見翰苑乃是非之地，請託既多，忌恨不少，初在此為官立足，立身處事即須謹慎警覺，對於自我獨能、旁人不能之事，切勿得意忘形。

王肯堂善醫，身心狀況卻不甚佳。在家備考時，一直有飲食量少與疼痛便血的問題，王樵因其擅醫，以為必能自癒，未料在翰苑亦復如是，故深表憂心：

<sup>81</sup>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0冊，卷2，頁140。

<sup>82</sup> 任道斌編：《董其昌繫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29，按語謂：「（此碑文）拓片現藏北京圖書館，尺寸為152厘米×90厘米。」

<sup>83</sup> 秦小平：〈王肯堂傳略〉，頁10。

<sup>84</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卷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293。

書來云：「勞而嘔而怒則滿」，見嘔何不節勞？覺滿何不戒怒？必云：「勞非不欲節，有不得已者；怒非不欲戒，有不可堪者」，此在他人則無可說，汝既通佛通醫，到此全不得力，是止能醫人而不能自醫，止能敬佛而不能即心是佛。即心是佛者無他，鍊心而已。<sup>85</sup>

王樵希望其子能以醫理、佛理調節身心，所謂「鍊心」，來自對病根的推究，他在另封家書分析：「汝既不飲酒，又無聲色貨利之貪，所以有前患者，多是於七情上得之，此中須大作工夫也。」<sup>86</sup>是知王肯堂病狀與個性直切有關，加上體質偏弱，又面臨人際、館課等諸多勞頓與壓力，故王樵家書數謂：「任性任直，願汝深戒。養德養身，願汝勉勵。」<sup>87</sup>

#### （四）館課競寫

館課乃翰苑館試與閣試的統稱，為王肯堂的主要壓力來源。館試由館師命題，檢驗詩、文寫作，成績不予排名，閣試則為每月朔望日的考核，由閣師命題，詩、文各一篇，成績予以排名<sup>88</sup>，教習結束「散館」前的最後一次閣試，尤為分發任官的依據。館課的命題範圍很廣，小至抒懷言志，大至尚論古今、擘畫國計，均須言之有物。而詩文各體務必兼擅，或代王言，或述臣職，或揚國威，或展現史識才力，以因應日後擔任詞臣、史臣之要務。館課的考評亦有標準，必須文辭典實、體格雅馴、議論切合事情、歌詠寄寓規諷，凡此皆與取得科名的時文寫作有所不同。<sup>89</sup>

惟到萬曆時，不惟科場風氣日壞，館課亦有流弊，如《萬曆野獲編》所言：「惟庶常自考改以後，仍親筆墨，朔望有閣試，每旬有館課，近來又多屬之捉刀人，蓋

<sup>85</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頁 298。

<sup>86</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頁 298。

<sup>87</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頁 300。

<sup>88</sup> 明·徐階：《世經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0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卷 20，〈示乙丑庶吉士〉，頁 47。其後閣試改為春、秋二季的朔望日，見明·張位：《詞林典故》，收入余來明、潘金英校點：《翰林掌故五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庶吉士館規〉，頁 330。

<sup>89</sup> 有關館課的討論，可參考連文萍：〈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政大中文學報》12（2009.12），頁 231-260；〈明代翰林館課與儒家經世實政——以王錫爵《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96（2016.1），頁 111-117。

挾冊傳代諸弊，視里試有加焉，即博學宏詞，故自不乏，然才力每以應酬奪之。」<sup>90</sup>王肯堂才力甚佳，又不耽於酒色應酬，故王樵僅以讀書相勉，未以館課流弊相戒，且王樵沒有寫過館課，因此要求寄來一看：

書來言館中工課及屢試名次，吾素不知工課作何事，今汝書中又不詳及，今後可將所業并試題與文寫來知之。汝三試，一次第七，一次第三，一次第二，不為不高，但不專在此第一，蘊藉涵養為要。<sup>91</sup>

王樵所謂「三試」，即指庶吉士每月朔望日的閣試，王肯堂的名次「不為不高」，但王樵叮囑不可必爭第一，仍以養德為先。其後，其名次一再居先，王樵家書有謂：「二月十五日、四月初一日，兩次閣試俱第一，自此間或讓人一考無妨」<sup>92</sup>，可見王肯堂已掌握館課寫作要領，證明無愧「館元」之名，王樵除感欣慰，仍恐其鋒芒太露，故戒以「間或讓人」。

王肯堂的館課全貌今已難悉，但由《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皇明館課標奇》等館課彙編<sup>93</sup>，仍可輯出館課文二十三篇、詩十六首。其中〈國朝從祀四先生贊〉為閣試第一之作，〈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論〉為閣試第二之作，其餘館課則未詳註名次。<sup>94</sup>

館課彙編是當世流行的科舉用書，旨在選取館課佳篇，提供考生習仿。王肯堂

<sup>90</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5，〈閣試〉，頁391。

<sup>91</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卷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298。

<sup>92</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卷9，頁302。

<sup>93</sup>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署為王錫爵等編。《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版本見註25），署為王錫爵等編。《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5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署為沈一貫刪定。《刻館閣新課評林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間坊刊本），署馮夢禎等編。《皇明館課》，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48-5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署為陳經邦等編。《皇明館課標奇》，收入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第5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署為張位編。

<sup>94</sup> 王肯堂的館課篇目，請見本文附錄〈王肯堂館課著錄概況表〉。



館課為多部彙編選錄，足為典範，亦可見其才具學養涵蓋多方，不僅贊、論、疏、序、說、表、頌兼擅，亦精於古、近體詩，明末沈國元《皇明從信錄》評論萬曆己丑科翰苑教習謂：「得人最盛，而王肯堂、劉曰寧、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周如砥、朱國楨，文望尤表著，而吳道南位至東閣。」<sup>95</sup>可見王肯堂成為此科庶吉士中「文望表著」者之一，其文學表現在當世獲有佳評。

## 六、散館分發與貶謫辭官

庶吉士「開館」後，約三年學成，依照考核成績分發任官，稱為「散館」。前引王樵家書謂：「館選美矣，及解館之日，又有說焉。留在翰林者為上，出為科道者次之，且科道自外官行取者視為極選。」可見散館多有角逐，以留在翰林院擔任編修、檢討為美除，出為給事中、御史次之。<sup>96</sup>王肯堂此時則面臨散館避讓與否的掙扎及揮之不去的謗毀。

### （一）散館的角逐

萬曆 19 年（1570），即將學成散館，一甲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照例留館，並無爭議，王肯堂為館元，留館機率高，但仍有閣試名次、地域名額等條件，加上出身三甲太後，易增添變數，因而心中忐忑難安，王樵家書謂：

庶吉士讀書已經三年，學有成效，例該內閣查平日考校先後名次，重加考試。取文理優長及文理亦順者，分上中卷，封進御覽裁定，發下吏部。照例上卷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中卷授科道部屬，照原定次序，各本題請，此定例也。汝係館元入館，復累試俱前，而又曾有三次閣取第一，理是應留，但聽之造命者，非所當預言。但汝書來言，與董玄宰俱在應留之列，但合天下

<sup>95</sup> 明·陳建撰，沈國元訂補：《皇明從信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36，〈己丑萬曆十七年〉，頁 628。

<sup>96</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71，〈選舉志三〉，頁 461：「給事中、御史謂之科道。」

留止三人或四人，而吳人一時並留二人，恐當路難之，必須一人引避，以待兩次補官，庶不相礙。此固有理，但汝館元也，將及三年，學有成效，內閣查平日考校先後名次，重加考試，以定去留，又明例也。汝與玄宰論平日考校先後，則不相上下。論館序，則汝是館元。既到館，則論館中次序，豈論二甲三甲。汝以玄宰為二甲之首，而欲讓之居先，恐無是理，況此亦須請教大老。以吾言之，朝廷作養之意，要個個成材中用，計校及此，是但知有私計，而意不在學有成效以報朝廷也，宜審思之。今身子是國家身子，一言一動，關係遠大，豈可輕哉。<sup>97</sup>

王樵詳述分發定例，再分析情勢，「玄宰」即董其昌，與王肯堂為南直隸同鄉，館選已見角逐，此時又受限於地域留館名額：「吳人一時並留二人，恐當路難之，必須一人引避，以待兩次補官，庶不相礙」，加上董其昌為二甲首名，閣試名次又相當，所以王肯堂考慮引避退讓，以待兩次補官。王樵以家書極力勸阻：

唯前書所言避歸之說，近以質之鳳阿姜丈。姜丈歷數同鄉二人一時並補官者甚多，並無館元避二甲首名之理，況一歸則須二次題授，臨時又費廟堂一番斟量，自家又就一番鑪冶，甚非計也，已之已之。<sup>98</sup>

王樵請教之「鳳阿姜丈」為姜寶，字廷善，嘉靖 32 年（1553）癸丑科進士，其孫女嫁予王懋錕<sup>99</sup>，與王家是兒女親家。他是朝中大老，熟諳官場文化，認為避歸並非良策，王肯堂可能聽從他的建議，不過真正的關鍵在於董其昌。

董其昌顯然也考慮分發問題，正好此年閏三月十八日館師田一儁病逝<sup>100</sup>，他即自願請假，護送館師靈柩歸返故里福建。因為屆臨散館，董其昌此舉將導致無法參與閣試考評、分發，須待兩次補官，這是重大決定，他日後在〈邢子愿法帖序〉提及此事謂：

<sup>97</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06。

<sup>98</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02。

<sup>99</sup>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 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 547：「孫五：長懋錕，娶司寇姜公寶孫女。」

<sup>100</sup>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 234，〈萬曆十九年閏三月辛未〉，頁 4338。

余為庶常時，館師田公宗伯病且劇，同館議以一入行者，余為請急，卒成掛劍之遊。子愿太僕曾為近體一章，推余意氣，論交自此始。<sup>101</sup>

「邢子愿」即邢侗（1551-1612），萬曆 2 年（1574）甲戌科進士。他稱頌董其昌的義舉，寫有〈松江董吉士玄宰以座師田宗伯喪南歸慨然移疾護行都不問解館期壯而賦之〉，今見於《來禽館集》。<sup>102</sup>顯見董其昌「不問解館期」，不僅是尊師，實質就是「引避退讓」，故而同僚「壯而賦之」。王樵家書亦論及此事：「董思白一節，似傷直致，況彼之請告，則補官當在汝後，無以溫存之，而以此小故追讓之可乎？我當婉轉以致厚於其家，汝亦當再三申欵於在京，比他人加密，始為相當也。」<sup>103</sup>董其昌之舉，深獲佳譽，日後入錄《明史》<sup>104</sup>，相形之下，王樵急切於功名之想，格局境界不敵董其昌。

王肯堂面臨的嚴重問題還有毀謗。王樵為此致書，對於與王錫爵之交情，自認是「君子以道義相知，豈有不厚，厚則所以相報相成，豈有不正大光明」，並強調「吾父子孤寒守拙，其所以與當路相知，人人可得而知之也。貪榮躁進，讒諂面諛，沽名賣直，皆所必無，忌我何為哉？亦不待日久而見睨曰消矣。」<sup>105</sup>可知其教子坦蕩面對，相信不久就會停息。但事態並未緩和，王肯堂急欲上疏明辯，王樵再予勸止：

今何時乎？王荊老何人乎？而可以此厚誣乎？造誣至此，將謂皇上為何如主乎？且為此者，不過欲杜荊老之再出也。夫大臣進退，猶一人之事也，是非天下之公，世道消長所繫，非一人之事也。有天下之志者，寧能無隱憂乎？汝辯疏不上為妥，蓋非久荊老必有疏矣。縱荊老不自言，而二三大老中必有能明之者，何也？此不比流言相傳從耳邊過，可以假為真，既有章疏，則有按據，設上或欲覈實其言，公卿間安得無定論乎？在汝新進之人，則以深厚

<sup>101</sup> 明·董其昌：《容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頁 123。

<sup>102</sup> 明·邢侗：《來禽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1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 3，頁 397。

<sup>103</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07。

<sup>104</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88，〈董其昌〉，頁 1997。

<sup>105</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08。

安重更見德器耳。彼激汝者，利汝之辯，切不可墮其計也。廷試之時，汝幾列鼎甲，而俄失其卷，填至三甲之半而始出，此大似有人藏匿之者。館選之時，荆老方移疾不出，若復陰薦一人，豈能掩人之知？即同邑王澹生肯默默而已乎？汝雖怨荆老不汲引，而終不能開此枉口，則以荆老之實無干預，人人知之而已，不能奪也。忌汝之人，既無可尋索，則以杖饒一事，冀可以簧鼓一時。汝如新媳婦，雖終於點涸不上，而有此虛聲，致費解說，只此已非始進之利也矣。<sup>106</sup>

王樵首先分析毀謗之由：一繫於他人，乃內閣權位的搶奪；一在於自己，乃才學、際遇為人所妒。接著說明館選之時，王錫爵正引疾不出，不至干預遴選，如真有不公，「王澹生」——王士騏何以默不作聲？最重要的是，務必明白利害關係，不可墮人之計，引起注目或論辯，且章疏將成為按據，始進之人尤須深厚安重，以養德器。

文中「杖饒一事」，指前文所述萬曆 16 年（1588）禮部郎中高桂摘發順天鄉試舞弊案，萬曆 17 年二月饒伸（萬曆 11 年進士）上疏為高桂辯護，反被明神宗論罪下獄，文秉（1609-1669）《定陵注略》論及此事，以為王肯堂「素強直自遂，為諸生時文名籍甚」，與申時行、王錫爵二輔為通家，又精醫理，故時為二輔所延入，「饒伸之受杖也，都中喧嘩，太倉怒甚，肯堂在旁愆愆重處，以此大犯公議」。<sup>107</sup>「杖饒一事」見錄於王樵家書，顯見此說甚囂塵上，王肯堂是否有機會、有力量「愆愆重處」？雖是令人懷疑，但他受到公議質疑，成為攻擊焦點，這股暗潮糾纏不去，確實「已非始進之利」。

王樵家書亦引述相士之言，謂：「昨星士項子詣某，問汝官運有幾年，項答：『有二十五年好運』，某云：『但恐為王荆石所累耳。』」項子將此事告知王樵，惟家書中未明言「某」之名氏，王樵力駁其說，為王肯堂分析道：「出此言者，意在相脅也。蓋彼家結納新援、銳希新福不利，汝在朝，恐妨彼行事耳，無計以速汝之歸，賴此彈章，利汝奏辯，使汝自與言路為敵，則彼計行矣。」<sup>108</sup>王樵之論謹慎合理，「彼」

<sup>106</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頁 309。

<sup>107</sup> 明·文秉：《定陵注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卷 3，〈癸巳大計〉，頁 4-5。

<sup>108</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09。

為何人，雖未明言，但顯然是父子共知的明確對象。王肯堂未上辯疏，順利於此年八月參與閣試，獲評為「上卷」，以三甲進士獲授翰林院檢討<sup>109</sup>，得以留館。而護館師靈樞回故里的董其昌，則於萬曆 20 年（1592）春回京，以二甲進士獲授翰林院編修。<sup>110</sup>

## （二）自請練兵海上

王肯堂在翰林院居官短暫，被歸入王錫爵黨羽，多受攻訐，百口難辯。萬曆 20 年（1592），日本關白豐臣秀吉（?-1598）率海軍進攻朝鮮，攻陷王京，朝鮮王奔逃平壤，朝廷派遣東征提督李如松（1549-1598）率軍進援。萬曆 21 年，李如松軍大捷於平壤，收復開城，惟追擊時中伏，退屯開城，而日軍則糧盡，棄王城南走，據釜山不去。<sup>111</sup>這次「倭寇朝鮮」事件，是王肯堂仕途的重要轉折：

時倭寇平秀吉破朝鮮，聲言內犯。大司馬倉皇募士，肯堂請其不選不練，如驅市人而戰。疏陳十議，願解史職，假御史銜，練兵海上，效涓溪之報。疏留中，忌之者眾，引疾歸。<sup>112</sup>

「大司馬」應指兵部尚書石星（?-1599），王肯堂對其募兵而不練兵有意見，自請擔任御史練兵海上，疏留中，導致其於萬曆 20 年憤而引疾告歸。王肯堂所以自請自薦，應與王樵有關，考察王樵家書，曾與之談論朝鮮軍事，並對「倭寇朝鮮」加以評論：

鄭、宋兩經略如出一轍，都只是苟且，敵未款我，而我先款敵，前後不過飾詞以欺朝廷。沈惟敬先以封貢許之，故復平壤、復王京如此之易。倭奴之狡，其於利害甚明，而中國反出其下。彼之讓出平壤、王京，非畏威也，非悔罪也，勢實不能越海而兼有兩國也，縱曰關白能據朝鮮，則海中必有據日本以

<sup>109</sup>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 239，〈萬曆十九年八月甲辰〉，頁 4434：「甲辰，試庶吉士十五名，上卷八名：黃輝、莊天合、王肯堂、劉曰寧、區大相、周如砥、林堯俞、馮有經，銓註翰林院編修、簡討。中卷七名：吳鴻功、羅棟、郭士吉、喬胤、徐彥登、馮從吾、顧際明，授科道等官。」

<sup>110</sup>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 260，〈萬曆二十年五月辛巳〉，頁 4832。

<sup>111</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320，〈朝鮮〉，頁 2240；卷 237，〈李如松〉，頁 1674-1675。

<sup>112</sup> 清·郭毓秀：《金壇縣志》，卷 12，〈王肯堂〉，頁 41。

及關白者矣。此關白所以不得不歸，而又得沈惟敬許以封貢之利，更出望外，情形實如此。<sup>113</sup>

此家書下署「甲午」，乃萬曆 22 年（1594）所寫，但王樵一直關注軍情變化，先前已預言朝鮮諸戰況，得到友執的推服，亦曾上書王錫爵，可是「王相公不受書，前書俱不曾遞」。<sup>114</sup>此外，王樵曾有抗倭戰功，萬曆元年（1573）被起用為浙江僉事，分巡浙西，即注重軍務，勤於練兵，倭寇進犯浙江沿海，其帶兵反擊，擊沉倭艦四艘。<sup>115</sup>因此王樵並非書生議論，王肯堂受到影響，對朝鮮戰役多有關切，進而毛遂自薦。

王肯堂對朝鮮軍情是否清楚掌握？自請擔任御史練兵，是否基於一時義憤？今已不易推究。但其年已四十，爭取留任翰林，又自請練兵海上，顯見有心用世，希冀及時報國。若由另個角度觀察，國家有事，需人孔急，才會「倉皇募士」，而翰苑教習庶吉士的制度，標榜經世濟民、日後大用，卻未鼓勵敢言力行，或是給予引導歷練，是則翰苑之所謂「得人最盛」，竟只在詩文詞章及官位顯赫而已。當然，翰苑以培養文職詞臣為主要目的，故王肯堂之請頗見唐突，亦實顯明代文臣、武將之選任有其規則，王肯堂並未掌握這個規則，以致「疏留中」，無法成就報國之忱。

### （三）京察的中傷

「京察」是明代考核官吏的制度，每六年舉行一次。<sup>116</sup>萬曆 21 年（1593）為京察之年，因王錫爵上承帝意，擬先「三王並封」<sup>117</sup>，再冊立太子，輿論大嘩。趙南星（1550-1627）、顧允成（1554-1607）等力諫<sup>118</sup>，又藉由京察，摒斥王錫爵之親黨，

<sup>113</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12。

<sup>114</sup>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4 冊，卷 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 312。

<sup>115</sup> 孟濟元主編：《金壇縣志》，〈王樵〉，頁 782。

<sup>116</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47，〈選舉志三〉，頁 463。

<sup>117</sup> 「三王並封」乃明神宗欲並封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為王，是為國本之爭。

<sup>118</sup>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231，〈顧允成〉，頁 1630-1631；卷 243，〈趙南星〉，頁 1703-1704。

王肯堂即在其中，被斥以「浮躁」。<sup>119</sup>其後趙南星被斥，此年四月，戶部主事賈巖上〈詮臣秉公計吏大臣挾私中傷乞賜分別去留以快輿論疏〉救之，疏中即明言：「檢討王肯堂、郎中殷都，乃錫爵通家心腹也，而以浮躁去。」<sup>120</sup>禮部員外陳泰來亦上〈京察大公中外悚服乞洞察以扶世道以正人心疏〉則直謂京察公允：

郎中趙南星前以論劾吳時來，忤今元輔王錫爵意，引疾而歸。不知元輔此來，亦有疑其干大計者，因二三戚里門生自知掛議，實以二夫望之，南星在事，不白朝房，不謁私第，所論黜降，如蘇鄴、徐泰時、殷都、王肯堂、李周策，皆粉榆瓜葛，不無刺心。<sup>121</sup>

王錫爵與趙南星等人之爭，除了「三王並封」，還與內閣權位有關，首輔援引門生，聯結朋黨，藉以鞏固施政，本即當日官場文化。然大權在握，易失於專橫決斷，以致黨爭愈烈，即使此時王肯堂已引疾歸里，仍為同僚點名指斥。無獨有偶，與王錫爵情誼深厚的焦竑，也為同官所忌，其出任皇長子朱常洛（1582-1620）東宮講官時，因王錫爵建議「仰遵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為圖說，名曰《養正圖解》」<sup>122</sup>，講官郭正域（1554-1612）謂其賈譽取寵。萬曆 26 年（1598）京察，亦被考以「浮躁」，其不堪苛求，棄官歸鄉，著書講學<sup>123</sup>，可謂與王肯堂殊途同歸。

萬曆 31 年（1603），王肯堂被貶謫浙江海鹽縣縣丞<sup>124</sup>，談遷（1594-1657）《國權》謂：「前翰林院檢討王肯堂謫海鹽縣丞，以善申時行、王錫爵鄉戚獲譴，人頗冤之。」<sup>125</sup>可見時論對其遭貶，皆視為係以「善申時行、王錫爵鄉戚獲譴」，因而多予

<sup>119</sup> 清·郭毓秀：《金壇縣志》，卷 12，〈王肯堂〉，頁 41；「京察浮躁，降調」。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 47，〈選舉志三〉，頁 462；「考察，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其目有八，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罷，曰不謹。」

<sup>120</sup> 明·吳亮：《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6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 6，頁 360。

<sup>121</sup> 明·吳亮：《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68 冊，卷 6，頁 357。

<sup>122</sup>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 15，〈養正圖解序〉，頁 144。

<sup>123</sup> 焦竑任官與罷歸諸事，可參見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前，李劍雄：〈焦竑的生平、思想與著作〉。

<sup>124</sup>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 380，〈萬曆三十一年正月丁卯〉，頁 7155。

<sup>125</sup> 清·談遷：《國權》（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 79，〈神宗萬曆三十一年〉，頁 4904。

同情。萬曆 33 年，王肯堂復被降為浙江秀水縣縣丞。<sup>126</sup>至萬曆 34 年，則以王樵友執吏部侍郎楊時喬（1531-1609）的推薦，獲為南京行人司副，始復出任職：

丙午，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行人司副。人或謂詞林故物可立得，肯堂曰：「吾非愛一官，特以先恭簡公歷任五十載，未滿一秩，吾毋不得沾一命，故隱忍就此三載贈母太夫人，從恭簡階也。」<sup>127</sup>

王肯堂年邁力衰，勉強出仕，其意仍在「二親之光」，孜孜以榮耀母親為念。惟其仕途短暫，於萬曆 40 年（1612）乞休，官至福建參政，萬曆 41 年卒，年六十五。他在〈證治準繩·原序〉回顧仕宦經歷，有謂：

選讀中祕書，備員史館，凡四年，請急歸。旋被口語，終已不振。因伏自念受聖主作養厚恩，見謂儲相材，雖萬萬不敢望文正公，然其志不敢不立，而其具不敢不勉，以庶幾無負父祖之教，而今已矣。定省之餘，頗多暇日，乃復取岐黃家言而肆力焉。<sup>128</sup>

王肯堂的少年志願，意在效法「文正」范仲淹之存心濟物，雖久困場屋，終得選入翰苑，身受朝廷栽培，得為「儲相才」，希冀能夠內聖外王、經世濟民。無奈苦於黨禍政爭，沒有機會施展才學，不得為良相，只得為良醫，最終以醫術成就自我價值，但以科舉世家子弟而言，此乃愧對父祖之教，是個人與家族的失落。

## 七、結語

本論文蒐求相關文獻資料，論述王肯堂的應考、科名與仕宦，並透過其際遇與所處政治情境，照看晚明的翰苑教習、館閣生態與科舉風氣，以下以四端總結全文：

其一，王肯堂出身科舉世家，久困場屋，幸而成就一門三代進士之榮，說明了科舉世家子弟的個人價值與人生責任，在於維持家族的科舉事業與主流地位。科舉

<sup>126</sup>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卷 413，〈萬曆三十三年九月乙酉〉，頁 7742。

<sup>127</sup> 清·郭毓秀：《金壇縣志》，卷 12，〈王肯堂〉，頁 41。

<sup>128</sup>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 冊，〈原序〉，頁 2。



也帶來人際多方聯結，包括備考友執的砥礪、數代同年的世誼、同館至交的往來、館閣師生的互動等，交織出綿密的政治網絡，更以家族世代的聯姻，進行血統的親密交換與結盟。這樣的政治風尚有其利弊，一方面有助於壯大政治勢力及施政能量，一方面易招致營私樹黨的質疑與攻訐，王肯堂即捲入萬曆政壇的權力傾軋，終究難以自辨。

其二，王肯堂的科名經歷，見證出新進士名登金榜的榮喜，實因排名次第而有不同。一甲進士最為尊榮，人人推服，二、三甲進士則不無遜色，因而多見「一甲不預，則望館選」，力搏翻轉出身。此風氣緣自明初遴選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由朝廷教習培養，以備日後大用，故庶吉士被視為「儲相才」。但到萬曆時期，科舉制度施行已久，名門子弟參與館選者眾，皆勢在必得，加上科場風氣日壞，館選多生流弊，甚至淪為權臣施恩樹黨之資，雖有進士抵制，不與館選，然爭者眾，退者少，人情必洶洶，人才亦清濁難分。

其三，王肯堂名列三甲第一八四名，通過館選競逐，獲得「館元」殊榮。館元得以與解元、會元、狀元並列，前途似錦。然王肯堂始進時名第太後，館選卻掄元，被視為王錫爵世契，個性又直切，因此毀謗隨之，終致辭官貶謫。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統計翰林院官員名第之高，惟謂館元的仕途不佳：「詞林館元，更為不利」、「己丑則王肯堂為首，以檢討外謫，未出。」<sup>129</sup>是則王肯堂雖才學俱佳，終究成為「館元不利」的代表人物。而「館元不利」不只是個人際遇或是官場現象，亦凸顯翰苑是否擢拔真才？翰苑培育人才的制度與辦法是否切合內外交迫的國政所需？人才是否適才適所？這些都牽動著萬曆政局，值得省思。

其四，王肯堂在翰苑讀書，多方累積實力，館課詩文均屬上乘，為庶吉士的佼佼者，散館後獲授翰林院檢討。惟因不滿朝鮮戰事，自請假御史職練兵海上，疏留中，憤而引疾辭官，數被言官劾為「浮躁」，亦難以自振。他雖以醫學聞名於世，然其身陷黨爭傾軋，無所作為，不僅是個人與家族的悲哀，更見翰苑掄才育才成效難彰。他的去官雖有直切衝動等個人因素，卻也照見萬曆官場的險惡情狀，明神宗荒

<sup>129</sup>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7，〈詞林大拜〉，頁189。

殆朝政，言官透過京察扼削權臣結勢，朝臣不能戮力同心，反是各懷猜忌、營私攬權。有志之士儘管勇於立志，掄入翰苑，深受栽培，最終不能為國效力，甚至必須辭官避禍，無寧是國家最大損失。王肯堂的科名經歷，是萬曆時期翰苑與科舉文化的縮影，呈現出明廷所以步向衰亡的重要原因，足以作為後世國家政府育才經國的殷鑑。

## 附錄：王肯堂館課著錄概況表

篇名	館課彙編之著錄
因旱脩陳言時政疏（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館課經濟宏猷、皇明館課、皇明館課標奇
擬議國計疏	皇明館課、皇明館課標奇
備荒弭盜議（萬曆己丑館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館課經濟宏猷、皇明館課
正士風議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標奇
擬劉寔崇讓論（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論（閣試第二）	皇明館課標奇、皇明館課
刻十三經注疏序（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館課經濟宏猷
刻八大家集序（九月中旬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敘漢南北軍制略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標奇
屯政考（萬曆己丑館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
候氣說（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窮理盡性至命說（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
松柏後凋說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標奇
和同辨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
周禮園鐘六變西鐘八變黃鐘九變解	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館課經濟宏猷、皇明館課
答西北屯田水利問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標奇、皇明館課
讀衛霍李廣傳評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
蕭曹魏丙相業評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標奇、皇明館課
重寫累朝訓錄進呈表（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
擬儒臣奉勅脩歷代臣鑒外戚事鑒書成進表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皇明館課標奇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萬曆己丑閣試）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館課經濟宏猷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辛卯閣試第一）	皇明館課標奇、皇明館課
擬敬天勤民箴	刻館閣新課評林纂
九月讀淵明詩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
題省耕圖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代凜凜歲云莫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和昌黎石鼓歌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標奇
征虜將軍出塞歌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盆菊吟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賦得雲近蓬萊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標奇
賦得雨中春樹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標奇
仲冬即事二首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標奇
端午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皇明館課標奇
賦得玉壺水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賦得五星如聯珠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詠上苑桃花二首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
皇極門早朝	皇明館課標奇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明·文秉：《定陵注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 明·方應祥：《青來閣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3-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王彥泓：《疑雨集》，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續編》第17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明·王樵：《方麓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2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王衡編，王時敏續編：《王文肅公年譜》，收入于浩輯：《明代名人年譜》第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明·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王錫爵等編：《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2-9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王錫爵等編：《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2-9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吳亮：《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68-4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沈一貫等編：《新刊國朝歷科翰林文選經濟宏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5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邢侗：《來禽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1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范鳳翼：《范助卿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徐階：《世經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0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 明·袁衷等著：《庭幃雜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叢書集成新編》第 3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張位：《詞林典故》，收入余來明、潘金英校點：《翰林掌故五種》，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 明·張位編：《皇明館課標奇》，收入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第 5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陳建撰，沈國元訂補：《皇明從信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1-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陳經邦等編：《皇明館課》，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48-5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
- 明·馮夢禎等編：《刻館閣新課評林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坊刻本《新刻壬辰翰林館課纂》附錄。

- 明·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明·黃景昉：《國史唯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董其昌：《容臺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87。
- 明·顧秉謙等修：《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1966。
-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
- \*清·郭毓秀：《金壇縣志》，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 20 年序刊本。
- 清·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清·嵇璜：《欽定續文獻通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384-38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楊開第等纂：《重修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賈恩紱纂：《南宮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
- 清·談遷：《國權》，臺北：鼎文書局，1978。
- 不著撰人，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
- 孟濟元主編：《金壇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 陸拯編：《王肯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

## 二、近人論著

- 王重民：〈王肯堂傳〉，《醫史雜誌》3（1951.3），頁 41-42。
- 任道斌編：《董其昌繫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邱澎生：〈有資世用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33：1（2003.6），頁 1-43。
- 柯卉：《王肯堂的生平與學術》，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1。

- 倪梁康：〈王肯堂及其《八識規矩集解》〉，《中山大學學報》55：2（2015.3），頁 96-123。
- 秦小平：〈王肯堂傳略〉，《常州教育學院學報》4（1995.4），頁 9-11。
- 連文萍：〈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政大中文學報》12（2009.12），頁 231-260。
- \* 連文萍：〈明代翰林館課與儒家經世實政——以王錫爵《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96（2016.1），頁 111-117。
- 劉元：〈明代醫學家王肯堂的生平和著作〉，《中醫雜誌》1（1960.1），頁 67-70。
- 潘志剛：《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6。
- 潘華信：〈糾偏頗，振墜緒，拯世溺——評王肯堂的學術成就與貢獻〉，《上海中醫藥雜誌》10（1994.10），頁 1-4。
- 諸穎政：《晚明士人知識趣味的多樣性——以王肯堂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
- 鍾來因：〈王彥泓探考〉，《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85.6），頁 66-73。
- 鍾來因：〈《金瓶梅》·湯顯祖·利瑪竇·王彥泓父子——明季文學史上的文人關係〉，《福建論壇（文史哲版）》2（1986.5），頁 68-72。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ing] Dong Qi Chang, *Rong Tai Ji* [Poetic Prose Collection] adopted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The Series of Si Ku Banned and Burned Book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Qing] Guo Yu Xiu, *Jin Tan Xian Zhi* [The County Annals of Jin Tan], Kang Xi 20 Years editions of Naikaku bunko.
- Lien Wen-Ping, “*Ming Dai Han Lin Guan Ke Yu Ru Jia Jing Shi Shi Zheng: Yi Wang Xi Jue Guo Chao Gaun Ke Jing Shi Hong Ci Wei Zhong Xin*” [The Hanlin Classes on Poetry in the Ming Dynasty &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Governing — Focusing on Wang Shi Chue’s “The Grand Diction of Governing by the Central Classes on Poetry”], in *Zhong Guo Dian Ji Yu Wen Hua*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Vol.96, (Jan, 2016), pp. 111-117.
- [Ming] Shen De Fu, *Wan Li Ye Huo Bian* [Institutional System during Wan 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Ming] Wang Ken Tang, *Yu Gang Zhai Bi Zhu* [Wang Ken Tang’s Corpus] adopted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ntinuation of Collection of Books Compiled During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1998).
- [Ming] Wu Liang, *Wan Li Shu Chao* [The Imperial Court Memorials in Wan Li] adopted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ntinuation of Collection of Books Compiled During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1998).
- [Ming] Wang Qiao, *Fang Lu Ji* [Wang Qiao’s Chinese Classics Exegesis],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llection of Books Compiled During Qing Dynasty Wen Yuan Ge Versio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Ming] Wang Xi Jue, *Wang Wen Su Gong Wen Ji* [Wang Xi Jue’s Corpus], adopted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The Series of Si Ku Banned and Burned Book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 [Ming] Wang Xi Jue et al., *Huang Ming Guan Ke Jing Shi Hong Ci Xu Ji* [The Sequel of the Grand Diction of Governing by the Central Classes on Poetry in the Imperial Ming] adopted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The Series of Si Ku Banned and

Burned book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Qing*] Zhang Ting Yu et al., *Ming Shi*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Taipei: Tingwen Books Store, 1979).